



儿童文学 讲座

少年儿童出版社

儿童文学讲座

贺 宜等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儿童文学讲座

贺 宜等著

邹建华装帧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5.25 字数 127,000

1980年8月第1版 198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0

统一书号: 10024·3731

定价: 0.40 元

出 版 说 明

一九七八年九月至一九七九年一月间，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儿童文学组和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举办了儿童文学讲座，共讲了十四讲，受到了听讲者的欢迎，不少同志希望能把这些讲稿编辑出版。为此，我们先选编了《教育儿童的文学》、《儿童小说的构思和人物形象》、《简论童话》、《报告文学浅谈》、《论科学文艺》五篇。并请作者在讲稿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

讲座中没有讲到的一些儿童文学课题，已请一些作者在撰稿。准备继续选编，作为本书的续编出版。

一九七九年八月

目 录

教育儿童的文学·····	音 兵	1
儿童小说的构思和人物形象·····	任大霖	25
简论童话·····	贺 宜	48
报告文学浅谈·····	李楚城	90
论科学文艺·····	叶永烈	115

教育儿童的文学

鲁 兵

一九六二年，我曾以同一题目谈过同一问题。

十六年过去，在这十六年中，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遭受了林彪和“四人帮”为时十年之久的严重破坏和摧残。儿童文学是文学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也无法幸免，小百花园被弄得满目荒凉。建国以来十七年，儿童文学谁在领导？当然是党在领导。“四人帮”把党的领导说成是“黑线专政”，把成批的儿童文学作品说成是“毒草”，剥夺了许多儿童文学作家和作者的写作权利，其中有不少人受到了迫害，京沪两家儿童读物专业出版社被封闭，当时叫做“彻底砸烂”。严重的摧残，造成严重的书荒。我们两亿儿童无书可读，陷入了严重的精神饥馑。

但是，历史的发展，终究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四人帮”横行十年，终于被扫进了垃圾堆。我们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文学艺术，我们的儿童文学，也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儿童文学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贯彻党的文艺方针和文艺政策，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作出最大的努力，这就是为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新一代，为使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作出最大的努力。所以我还是这么说：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

在这里，我认为回顾一下历史是很有必要的。

什么叫作儿童文学？“五四”以来有过各式各样的解说。有的说，儿童文学是写儿童的文学；有的说，儿童文学是以儿童为本位的文学；有的说，儿童文学是娱乐儿童的文学；还有的说，儿童文学是无意思之意思的文学……这些说法的角度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回避了或者忽略了“教育”二字，以儿童文学的某些现象或个别特征，掩盖了儿童文学作为教育工具的实质。

就这点来说，资产阶级的一些教育家、文学家还没有古代地主阶级的教育家、文学家来得直率。我国古代没有儿童文学这个名称，但是儿童文学是有的，不但有儿童文学，而且有儿童文学理论。明朝有个吕得胜，在他的《小儿语》的序言中说：

余不愧浅末，乃以立身要条，谐以声音，如其鄙俚，使童子乐闻而易晓焉，名曰《小儿语》。是欢呼戏笑之间，莫非理义身心之学。

又如同一朝代所刊印的《日记故事》，序言说：

《日记故事》一书，乃童稚之学。诚质往行，实前言，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事，悉举而备，使资幼学者讲习有所阶梯也。

他们的旗帜何等鲜明！他们公开宣称儿童文学要以“理义身心之学”、“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事”教育儿童，主张儿童文学要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服务。

古往今来，无论是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儿童文学都是教育工具，这是毫无疑义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利用儿童文学教育自己的子弟成为未来的统治者，同时利用儿童文学对劳动人民的子弟进行奴化教育，使他们成为未来的驯服的奴隶。《小儿语》中的“自家认了不是，人再不好说你；自家倒在地下，人再不好跌你。”《日记故事》中的“唾面自干”的故事，就是奴化教育的典型例

子。《爱的教育》自一九二六年被介绍到我国之后，曾风行一时，在这个作品中，有一些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的章节，写得生动感人，如“少年笔耕”，但作者虽然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来表现其对于穷苦孩子的同情和怜悯，即此书的主题“爱”。作品中的资产阶级及其子弟被描写成仁慈博爱、急公好义的人物，劳动人民及其子弟则被描写成性格上有缺点，甚至生理上有缺陷的可怜虫，他们是在资产阶级的“庇护”和“恩赐”下过活的。因此，他们在资产阶级面前，唯有“乞怜”和“感恩”而已。作者将“爱”的纱幕披在血淋淋的现实生活上面，美化资产阶级，麻痹劳动人民，因而维护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就成了这个作品的实际作用。

当然，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还有一些属于人民群众的儿童文学，列宁指出：“每个民族文化里，都有一些哪怕是还不大发达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里都有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产生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反映于儿童文学，就是人民群众自己创作的以及一些接近人民群众的作家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民间的童话、儿歌、故事，真是浩如烟海，它们绝大部分是依靠口头流传而保存下来的，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儿童，积累成为儿童文学的宝贵遗产。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我国文化史上一次伟大的革命。儿童教育开始受到社会的重视，同时，儿童文学也开始逐步发展成为文学中的一个独立的方面。叶圣陶、谢冰心在创作上作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寄小读者》就是这一过程中的产物。当时有不少人将大量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来，这对于文化交流和创作借鉴都是很有意义的，但是拿外国的粮食来给中国的儿童充饥，这终究不是个办法，而且有些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究竟有多少营养价值，也很难说。鲁迅在《表》的“译者的话”中说：“十来年前，叶圣陶先生的《稻草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

自己创作的路的。”鼓励儿童文学作家在自己的土地上开拓自己的道路。

这里特别需要提到鲁迅对我国现代儿童文学所作的贡献。这个题目可以写一本书，这里只能是提一提。

鲁迅的眼光非常远大，他在激烈的阶级搏斗中，看到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问题，关心儿童教育，关心儿童文学，在他的战斗的一生中，在这两方面所作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他在他最早的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中，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他号召人们“自己背起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完全解放我们的孩子。”鲁迅反对陈旧的、粗制滥造的儿童读物，反对以封建的、法西斯的思想去毒害儿童，为此，他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另一方面，对儿童文学的任务、特点、题材、语言，以至儿童读物的插图装帧，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关于看图识字、连环图画，他都写过专文。他的这些意见还有待我们去进一步学习和研究。鲁迅还为中国儿童介绍了外国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翻译了《表》、《小彼得》、《月界旅行》、《海底旅行》等。他还十分重视传统的继承，曾亲自抄录过：“羊羊羊，跳花墙，花墙破，驴推磨”等许多民间儿歌。

社会上，也包括文艺界，有些同志不太关心儿童文学，有的人甚至对儿童文学抱着某种程度的轻视态度，将儿童文学叫做“小儿科”。这些同志现在是不会上小儿科看病了，但是他们忘了，自己小时候是上小儿科看病的。没有小儿科行吗？这是关系到两亿人——全国人口近四分之一的问题。老实说，要当好小儿科医生也不容易。轻视儿童文学的人，在鲁迅面前应当感到惭愧，应当有所省悟。

中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并且建立了自己的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这是我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极其重大的转折。儿童文学第一次被作为无产阶级用自己的思想体系教育

儿童的工具，成为党的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早在一九二三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报《先驱》所发表的《儿童共产主义组织运动决议案》就已指出：“儿童读物必须过细编辑，务使其为富有普遍性的共产主义劳动儿童的读物。”“来实现儿童共产主义运动的总任务：在儿童稚嫩的脑子里，栽下共产主义的种子”，“培养未来的同志”。我国无产阶级的儿童文学就是遵循党的这一指示精神发展壮大的。

我国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的发展状况，过去很少有人注意。战争年代资料散失是一个原因，但是主要的还是由于重视不够，没有一个专业部门来做这方面的工作。一九六〇至一九六二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初步开展了搜集整理资料的工作，就感到大有可为，可惜这一工作没有能够持续下去。

最早为儿童写作的有我们党的领导同志彭湃，他的《劳动节歌》和《田仔骂田公》是在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间写的。蒋光赤在一九二四年写了《十月革命的婴儿》这首充满革命激情的诗。一九二六年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机关报《工人之路》的副刊《小孩子周刊》，一九二七年中国济难会儿童团的《济难儿童》，是现在见到的最早的革命儿童报刊，它们在革命风暴中起了教育儿童、团结儿童的战斗作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儿童文学由于和革命斗争紧密结合，和人民群众（包括儿童）的斗争生活紧密结合，有了大踏步的发展。成千上万首革命儿歌，教育儿童懂得“不怕拳头小，只怕拳头少，千千万万拳头团结起，就把土豪打成泥”的革命道理，树立“养只八哥绿莹莹，放到天上捉老鹰。莫看人小心不小，三岁孩子当红军”的革命志气。当时的白区，许多革命文艺刊物如《前哨》、《拓荒者》、《文学月报》、《北斗》、《新地》、《大众文艺》等，都刊登儿童文学作品，许多革命作家为儿童写过作品，如郭沫若的《一只手》，胡也频的《小人儿》，洪灵菲的《女孩》、冯铿的《小阿强》，柔石的《血的沸腾》，应修人的《旗子的故事》、《金宝塔

和银宝塔》等。这些作品有的描写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有的揭露了当时社会的罪恶，使儿童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下见到革命的曙光，鼓舞他们走革命的道路。张天翼的《秃秃大王》和《好兄弟》（《大林和小林》）以政治漫画的手法，深入浅出地为儿童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到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儿童文学所反映的生活更加广阔了，它的体裁形式也更加完备了，出现了许多激发爱国主义和革命精神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的一个突出成就是生动地塑造了少年儿童英雄的形象，如华山的《鸡毛信》，李季的《报信姑娘》，周而复的《晋察冀童话》等。这时期，各地区都办了儿童刊物，如一九三八年六月在延安创刊的《边区儿童》，毛主席为该报的题词是：“儿童们起来，学习做一个自由解放的中国国民，学习从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争取自由解放的方法，把自己变成新时代的主人翁。”华北有《青年与儿童》，华中有《儿童之友》、《华中少年》，西北有《西北儿童》等，这些刊物大大地促进了儿童文学的创作。在沦陷区的上海，少年出版社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出版了贺宜的小说《野小鬼》、童话《凯旋门》，苏苏的《小癞痢》、《汉奸的儿子》等二十多个作品，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宣传团结抗日。在抗战胜利后的上海，《新少年报》和《童话连丛》在团结作家，促进创作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建国以来，党为儿童文学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天地。五十年代初期，党进行了反对黄色书刊的斗争，并在一九五四年举行了儿童文学评奖。接着，在一九五五年，《人民日报》发表了《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的社论，指出解决少年儿童读物的种类、数量、质量问题，是少年儿童教育事业中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中国作家协会相应作出了发展儿童文学的指示。除了儿童文学作家和作者，有许多著名作家都制订了规划，为少年儿童创作。同时有许多新生力量涌进了儿童文学创作队伍。队伍壮大，创作繁荣，许

多同志回忆到当时的情况，都说那是儿童文学创作的“黄金时代”。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了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使儿童文学在共产主义教育方向一致的前提下，题材更加广阔，形式更加多样，进一步繁荣起来。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没有此后极左路线的干扰和破坏，今天的儿童文学将是怎样一个兴旺发达的局面。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来看，这使儿童文学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儿童文学不仅有民族的传统，革命的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发展的经验，后来平添了一份难得的反面经验，可能在今后发展过程中把步子迈得更快。

上面谈了一点历史，归结到一点，还是说明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

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教育目的，不同的教育内容，这也就决定它们的儿童文学的不同性质。

我们的儿童文学，是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儿童文学。我想，还应当说得更加具体一些，儿童文学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不同阶段，还应当有不同的特征。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我们的儿童文学应当有新的发展，新的特征。它和“五四”以来，苏区、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儿童文学，国统区、沦陷区在我们党领导或影响下的儿童文学和建国以来十七年的儿童文学，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毫无疑问，我们应当很好地继承过去的优良传统、总结过去的经验，但是今天的儿童文学所担负的具体任务，毕竟有所不同了。

在新的历史时期，儿童教育所应突出的是科学、民主和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这三个内容。共产主义思想品德的教育，我们一向重视，而且卓有成效。我们都能想起一九六三年学习雷锋，不论在社会上还是在儿童中间，都出现了很好的风尚。可是这一教育中断了

十年，共产主义的风尚在很大一批人，包括很大一批青少年中间，被贪图安逸、追求享受、讲究实惠、自私自利，以至尔虞我诈、为非作歹所代替。社会上的恶习影响了儿童，儿童带着这些恶习长大，又影响了社会。这是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严重内伤。今天，加强共产主义思想品德的教育已成为实现安定团结、促进“四化”建设的一个先行的任务。

科学和民主，是“五四”运动所提出的民主革命的任务，六十年过去，这一任务并没有完成，这是林彪、“四人帮”得以推行现代迷信，实行政治的和文化的专制主义的社会根源。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想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略去民主革命所应完成的科学和民主的任务，就来建设社会主义，这就象《百喻经》里的一个故事所说的，建造没有一层二层的三层楼。

全国科学大会之后，科学教育受到学校和社会的重视，许多科技工作者，科普作者和儿童文学作者，共同垦植了荒芜十年之久的科学文艺这个园地，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受到儿童的欢迎。这些作品给儿童介绍了广泛的知识，激发了儿童学习科学的热情、献身科学的志气，同时以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去影响他们。现在已有《我们爱科学》、《少年科学》和《少年科学画报》三个刊物，许多省市的出版社规划出版适合各个年龄阶段儿童阅读的知识丛书、知识画库，这是十分令人欢欣鼓舞的。

民主教育，在当前的儿童文学创作中还没有明显的反应。写学校生活，特别是写少先队生活的小说和诗歌很少很少。少先队是对儿童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组织，这种教育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让儿童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接受民主精神的熏陶，让他们从小学习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自己管理自己，教育自己，解决自己学习和生活中的问题，关心集体，尊重群众，善于独立思考，敢于大胆创造。这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所必不可少的。少先队组织恢复以来，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开展了丰富多采生龙活虎的活动。儿

童文学作者到学校里去，到儿童中去，写新一代的实际生活，塑造出新一代的典型形象，这已成为儿童文学创作的一个迫切任务。

下面，我来谈谈儿童文学的题材问题。

儿童文学的题材十分广阔，这是不待说的。那么是否一切题材都能为儿童文学所用呢？儿童文学在题材上是否有所选择，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呢？我以为，回答是肯定的。选择的依据就是儿童的年龄特点。社会生活错综复杂，讲给儿童听，他们或者一知半解，或者茫然不知所云。这种“对牛弹琴”的笑话，在“四害”横行时就闹了不少，给幼儿园的孩子讲“法家”故事就是一例。

我们都知道《诚实的列宁》这个有名的故事，幼儿园的孩子听得懂，喜欢听，因为这个故事里所说的，就是他们自己的生活里所遇到的事情。他们应当怎样对待这样的事情呢？他们从幼年的列宁那里找到了正确的答案。但是如果我们将《列宁在十月》的故事讲给他们听，要求他们了解这个故事的深刻内容，这显然就办不到了。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从儿童年龄特点这个实际出发，来选择写作品的题材。同时，还必须从儿童年龄特点这个实际出发，来考虑同一题材的选材角度。

在儿童文学的题材问题上，曾经讨论过着重写儿童生活，还是着重写工农兵生活的问题。有的同志认为：工农兵方向是包括儿童文学在内的整个文学艺术的方向，儿童文学如果不是着重写工农兵生活和斗争，也就很难体现这一方向。

在学术上，不同意见，不同的见解，开展讨论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但是这一讨论，未能展开，而且被压制下去了。有人说：主张儿童文学着重反映儿童生活是什么“儿童文学特殊论”，是什么“排斥工农兵”，“背离了文艺的工农兵方向”。

儿童文学是文学，因此，它必须服从文学的党性原则，同时，还必须恪守文学自身的一般规律。这是共性。但是，它之所以称为

儿童文学，就必然具有自己的特殊性。这正象儿童和成人一样有鼻子有眼，可是儿童的身材、体力、智力、心理，又有别于成人。说有特殊性，就是什么“特殊论”，真是荒谬绝伦。“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分管文教的余党公然宣称：凡是儿童在看的电影，也就同时是儿童电影，于是将他自己插手炮制的毒草《春苗》硬塞进儿童电影周。按照他的说法，儿童看了《红岩》，《林海雪原》，《水浒》，这些作品也都同时是儿童小说了。这不仅否定了儿童文学的特殊性，而且否定了儿童文学的存在。“四人帮”抹煞儿童文学的特殊性，或者叫做儿童文学特点，是有其险恶用心的。因为这一来，什么“尊法反儒”的题材，什么“反复辟”、“反倒退”、“反回潮”的题材，什么“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题材，以至什么“斗大走资派”的题材，就可以通行无阻地涌进儿童文学，为他们篡党夺权大造舆论。在“四人帮”的控制下，不是就有大批的这类所谓儿童文学作品出笼吗？

说儿童文学着重于儿童生活的题材就是排斥工农兵，这是莫须有的。既然说的是“着重”，也就说不上“排斥”。儿童文学需要写工农兵，需要写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以他们的形象去教育儿童。过去就出版过许多这样的儿童文学作品，比较而言，写兵的更多。在这些作品中，有的完全写的是工农兵，如《黄继光》、《邱少云》、《董存瑞》；有的写的是工农兵，其中也出现儿童形象，如《雷锋的故事》、《铁路老工人》。这些作品是否称得上儿童文学，关键在于它们是否具备儿童文学的特点。如果具备这种特点，那么就是当之无愧的儿童文学作品，如果相反，不具备这种特点，那么即使写的是儿童，也称不上是儿童文学作品。林黛玉进荣国府的时候才十三、四岁，宝玉比她大一岁，如果生在现在，都在戴红领巾的年龄阶段，大概不会有人把《红楼梦》写宝玉黛玉之间的关系的章节，看作是儿童文学的。

我们再来看看反映儿童生活的，也就是以儿童生活为题材的作品。这些作品是否排斥了工农兵呢？我们知道，儿童是社会的

儿童，他们生活在成人之中，而且是在成人的教育和影响下成长的。在家有父母，在校有师长，他们还接触到社会上的许多人。我们说的这个“成人”，在我们社会，最大多数是工农兵和知识分子。因此，反映儿童生活的作品，完全不写到工农兵和知识分子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可以指出大批反映儿童生活的作品来，它们不但同时写了工农兵和知识分子，而且工农兵和知识分子总是居于教育者的地位。在教育者中排斥知识分子，这是荒唐的。对儿童来说，天天接触的教育者是教师和少先队的辅导员。他们阅读文学作品也是在接受教育，所以作家当然也是教育者。他们和科学家见面，这时候，科学家的工作对象不是科研项目，而是儿童，教育儿童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所以科学家也是教育者。儿童出版社、儿童报刊的编辑，儿童艺术剧院的演员，少年宫和儿童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都是儿童的教育者，都是“园丁”。

“篡改文艺的工农兵方向”，这个罪名看起来很吓人，其实不值一驳。毛主席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理解，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的实质就在于文艺为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服务。为什么人和写什么人有一定的内在联系，但终究不是同一个问题。如果单单从作品写什么人来判断作品为什么人，那么某些文艺现象就是不可理解的了。比如文艺有暴露敌人的任务，以敌人为主人公，甚至全场只见群魔乱舞的作品，也是应当允许存在的。那么，我们应当怎样来看待这样的作品呢？按照“四人帮”那个怪论：为什么人就只能写什么人，写什么人也就是为什么人，那么现在一些揭批“四人帮”的漫画和相声，岂非成了为“四人帮”服务的文艺了吗？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东西，总是站不住脚的。但在前几年，“四人帮”那一套也确实唬住了一些人，吓倒了一些人，以至现在还有些同志心有余悸。我们必须深入揭批“四人帮”，把他们那个“左派”的面具撕得一千二净，还其反革命的本来面目，这样才能使自己从精神枷锁中完全解放出来。

我们历来认为，以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辉形象，以工农兵和知识分子中的先进人物和英雄人物的形象教育儿童，鼓舞儿童，是德育中的重要一课。在儿童文学这本特殊的“教科书”中，必须有这重要一课。回顾一下十七年的创作和出版工作，不正是这样做的吗？在“四人帮”横行的这十年，这类作品倒真是写不成，出不来了。老干部都成了“走资派”，工农兵中的英雄模范都成了“黑标兵”，还有什么可写的呢？至于写我们的老一辈革命家，更是“罪莫大焉”，“为老家伙评功摆好”，这还了得？！在文学中，也在儿童文学中，排斥工农兵的不是别人，正是“四人帮”这伙阴谋家、野心家。粉碎“四人帮”以后，这重要一课才重新进入儿童文学，而且更被重视了。

在这类作品中，有的写到儿童，有的没有写到儿童，有的虽然以儿童为主人公，但是作者着重塑造的人物形象，作者用以教育小读者的人物形象却是工农兵。《雾都报童》是以报童罗川儿为主人公的一部儿童小说，作者在这部小说中不仅写了许多革命长辈，而且写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十分明显，作者所着力刻画的是周总理的光辉形象。对小读者来说，当然会从罗川儿身上学到许多东西，但是更使他们受到教育的，无疑是周总理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高贵的思想品质，关怀下一代的高度责任感。这部小说为创作同类小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同时为批判“四人帮”的反映儿童生活就是排斥工农兵的谬论，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例证。

儿童文学应当重视以工农兵和知识分子的先进人物的形象教育和影响小读者，同时，我以为，必须毫不含糊地指出，儿童文学应当着重反映儿童生活。儿童生活是我们整个社会生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别需要关注的部分，儿童文学不去着重反映，难道能要求成人文学去着重反映吗？儿童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需要正确的、具有针对性的诱导，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儿童文学。当然，我们也可以从成人生活中找到相应的题材，对儿童进行启发性的教育，比如用解放军遵守纪律的故事，教育儿童遵守纪律。但是我们无